

# 如何看待当下的农村

一年的行走与思考

## 张静：

非常欢迎大家到这儿来！洪范研讨会是我国思想智库中非常重要的品牌，它的特点是：通常会讨论比较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和中国当代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同时，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研讨会，有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聚集在这里，每次大家收获都很大。另外，更重要的是它是学界、官方、政策研究部门各个方面的人都齐聚的一个场所。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的嘉宾和客人都非常多，说明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关心。我介绍一下今天的报告人，他是刘守英教授，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工作。之后会有几位评议人和特邀嘉宾参与讨论，他们发言时我再介绍，欢迎大家参与讨论！那么现在先请刘守英教授讲他在乡村一年行走的思考。

## 刘守英：

其实过去一年大家看到我是怎么过来的，那么多老朋友，也有一些学生和新的朋友今天一起来讨论这么大的问题。起因是什么？是洪范所的文旭我打电话，他说：“刘老师你去年去学校的时候，第一讲是到我们洪范来讲的，正好快一年了，是不是要回顾一下今年一年都干什么了？”我说：“今年不都已经在朋友圈晒过了吗？”但他跟我讲了以后，我还是想了一下，跑了那么多的地方，实际上还是有一个主线的。主线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目前可能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村庄。我们过去的农村政策对农业问题比较关注，农业问题主要就是粮食问题，粮食问题既是国家的问题，也是农民的问题。另外，农民的问题大家也比较关注，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村庄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最后是要有一个载体来关注的，我觉得这个载体就是村庄。想到这个事以后我就开始跑了，我工作以后的第一站就是湄潭，然后其他主要跑的就是西部地区，另外也有一些发达的地区，比如北京郊区。今天我把安主任也请来了，因为都是他带着我跑的北京郊区。另外还有上海、浙江，今天我把浙江的何书记也请来了。另外就是去了松阳，我在这里面会重点讲，将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给大家作一个介绍。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后这一轮的村庄或者说农村变化的由头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整个这一轮的村庄或者说乡村的变化核心就是农人出村。从中国历史和现在来比较，中国这一轮乡村的变化由头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农民跟过去不一样。原来的农民基本上就是“以土地为生、以农为业”，就是我们在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农民也有工业化，但是农民不参与工业化，80 年代的乡村有工业化，但是农民是不离土的。但是，这一轮尤其是 90 年代以后，或者说“农二代”开始，整个中国农村或者说整个中国的结构发生了一场革命，由头是什么呢？就是“农二代”，60 后的中期以后、70 后、80 后到现在的 90 后，这一拨人开始出现的现象，是什么呢？我的概括就是：一个叫“离土”，一个叫“出村”，第三个特点就是“不回村”，就是 7 个字。第一个就是离开土地，离开土地到什么程度呢？一是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他的这块地在哪儿。我们问了很多农民，他是有土地，但是跟“农一代”比较起来，你看“农一代”，像我父亲那一代人，当时分田到户以后，他最高兴的就是带着我去转，看他的这些地在哪里，哪一块地是他的，他有多少块地。可是到了“农二代”，

他跟土地的隔膜跟“农一代”有非常大的差距。因此，现在农村变化非常大的就是人跟土地的关系。第一，这拨人不知道也不关心他的地在哪里；第二，务农的收入在这拨人手上也很低，务农的收入已经不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第三，这拨人整个就是“出村”。所以，最本质性的变化就是“离土”（不靠农），再一个就是“出村”。“出村”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第一，这拨人还是大规模、跨区域地流动，珠三角、长三角还是农民的主要去处；第二，我们现在一直讲农民回乡，但农民回乡并不是回到村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我们到下面去调研，很多人讲现在“农民回乡创业”等等，但事实上这一拨农民基本上不回到村庄。当然有回去的，但回去主要是回到县城，也有一部分回到乡镇。这是第三个特点——“不回村”。

第四个特点，“农一代”包括我们这一拨人，原来每年春节都要回到村庄，但现在的这一拨农民基本上只是春节回乡，但不回村，他们就是开着车回去却住在县城。我去调研的时候问了很多地方，每年各地县城的宾馆到了春节期间都是爆满的，尤其是穷地方（中西部地区）那些劳动力流出大的地方，农民基本上春节没完全回村，而是开车回到县城，住在县城或者镇上的宾馆，然后开着车回到村里转两圈就走了。

第五个特点是买房不盖房。上一代的农民工，尤其第一代农民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代农民的特点就是出去挣钱，然后把钱寄回来，所以你看我们当时的研究里面很大的一块就是讲农民汇款的事情。但现在的农民不回村盖房，就是我一直讲的“人走资本不回”。那么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呢？主要是到县城买房了。我们在娄县做了一个宅基地改革试点，现在在娄县县城买房的主体里面，农民占 50%，所以第五个特点就是农民在县城买房，不回村盖房。

第六个特点就是孩子的教育能够到县城的就到县城。当然这里面也跟我们原来的“并村”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我们到娄县去调研，一家非常穷，在娄县农村中算赤贫阶层，住在山上，男的腰在打工的时候受过伤，基本上站立都有困难，但是男的还是在家里干活挣点钱，而孩子的母亲则陪着孩子在县城读书，租的房子。所以，这一些变化是牵引整个村庄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大规模的迁移（见下图 1）。基本上还是中西部地区往东部迁移。

第二个就是外出务工。我们用的是统计局的数据，你看“农二代”外出务工的时间越来越长（见下图 2）。

另外就是不回到村庄（见下图 3）。乡以下出村的人口还是在继续增加，乡以下的人继续在减少。

另外就是整个农村人口在减少（见下图 4）。大家看，从 90 年代以后农村人口的占比大幅度下降。

还有一个就是村庄的减少（见下图 5）。

这是我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说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到整个农村的变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变量是“农二代”成为农民的主体以后，带来了农村、农业和整个农民这一块的变化，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我想讲村庄，我给它取了一个概念叫“衰而未亡”。“衰而未亡”是什么意思？我原来一直讲的是“衰败的村庄”，但是“衰而未亡”这个词是我去年给本科生讲发展经济学，后来我让每个学生写一个案例，其中有一个孩子就写的他的村庄，他提出了这个概念，这不是我发明的，是我的一个学生发明的。“衰而未亡”，就是说它在衰败，但是它没有亡。这里面实际上有很深的含义，我觉得这个词比我原来用的那个词更好。比如说最初我对村庄的惊讶来自于什么？来自我当时快离开发展中心的时候，我们一拨人到河北蔚县，它离北京大约 200 公里，有“小五台”之称，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导游看我们对他还挺好，后来他说：“叔叔我带你去我们村庄看看吧。”这就是他带我们去村庄看到的情形，这就是 4 年前的村庄（见下图 6）。

进到村庄看到的当然就是房子，一片破败景象，在整个村庄能见到的只有两类活生生的东西：一个是老人，另外就是狗。我们原来的概念是“那里应该有小孩吧。”但小孩走了，都出去读书去了，所以只有老人、狗与破败的房子。这给我非常大的刺激，你想：离北京那么近的村庄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看，这是安主任带我们去的房山区黄山店村（见下图 7）。这是宅改之前的样子，你能想像得到这是黄山店村，它离北京只有六、七十公里吗？

这是现在宅改的泸县村庄，泸县在哪里呢？它是泸州市的一个县，泸州有机场，到泸州市以后再到泸县只要一个小时。大家看，这是宅改前的泸县村庄（见下图 8），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这两个都是全国的改革试点。

这个是江西的余江。余江是个什么地方呢？就是毛泽东写的血吸虫没有的地方。大家看余江，整体破败（见下图 9）。余江刚开始搞宅改的时候，我就去了这个村庄，去了余江以后给我刺激最大的是在哪里？我们原来一直讲村庄“空心化”，以为“空心化”只是人走，但是余江给我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它不光是人走，还有村庄的空心和破败实际上是农村私侵公的结果。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初每人一块宅基地盖房子，接下来余江一些有钱的人把房子往大的盖，黄山村那个地方是往路边去，结果当有钱的人和村里面有一点势力的人往路边去以后，其他的人就跟着效仿，其他人都跟着往路边去，结果就把路给占了，没有路了，这就是“私侵公”。“私侵公”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整个村庄有大量的公地，这些村庄里有一些有势力的人比如村长，他先把这个地给占着，造一个菜园子，造了菜园子以后得需要废料，因此接下来就盖一个厕所，那么其他的农民说：“你搞一个菜园子，我也搞一个菜园子。”后来另外的人就说：“我去盖一个厕所。”所以，在余江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村庄里面的人“私侵公”。侵到什么程度？一个村庄可能会盖出四十几个厕所来。当公地部分占完以后，这个村庄就没有路了，也没有“公”的地方了，接下来就往外面扩，就是往路两边去扩。往路两边扩的结果就是老村的人往新村走，于是老村就空了。所以，这个“空”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的公私关系没有搞清楚，结果就是整个村庄不断侵公，最后导致整个老村庄不断破败，

人不断地走，不断地往交通便利的地方移动。

大家看，这个很漂亮吧？这是林芝的错高湖，很多人应该去过，左边是一个神湖，所以就希望把它保留下来（见下图 10）。

这个白马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通过民俗酒店来普及西藏佛教文化的。后来他们俩就带我一块到这个村庄去，到了这个村庄以后，这个村庄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我们原来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地方就是绿水青山，但它却很贫困。绿水青山跟贫困往往是在一起的，但是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就是看你怎么把这个地方的美丽山水的价值利用好。

大家刚才看了这几幅图以后，跟前面的文字对照起来的一个非常深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人不断汹涌地往村庄外跑，而且是一去不复返。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是村庄普遍的死寂一样的破败，这两者之间形成非常大的反差。那么你就要想这件事，把这两个图拼在一起，按道理“人口往外走”是符合趋势的，村庄慢慢消亡可能也是一个趋势，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人往外走和村庄的破败两个途径结合在一起以后，在我看来不是很正常。你去看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不是说城市化就是以乡村的衰败来作为代价的，人的城市化不一定就导致乡村的衰败。但是，我们现在的结果就是人能往外冲就往外冲，能够离村就离村，人走就不会再回来，能不回来就不回来。村庄呢？原来能够维系村庄活力的东西是靠农民自身在维系，最初大家是在一个土地上繁衍，而后来出去挣了钱再回来，不断地再盖房子以使村庄保持一点生机，而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是人不回来了，资本也不回来了，最后整个村庄就是破败。因此，我觉得中国人这种大趋势下的不正常主要的原因就是：

第一，城乡不平等的发展权。乡村为什么会如此破败？因为乡村没有任何发展机会，而城市什么都可以发展。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因为时间关系，就是说乡村失去了发展权利。

第二，城乡收入的差异。农民为什么不断地往外走？因为跟城市比较起来，乡村没有收入，出去打工一、两个月可能就比在农村干一年都要强，干嘛不往外走呢？

第三，乡村衰是因农业窄。我们去我国的台湾和日本看，没有见到乡村是这样的情况，尽管它的乡村是会“缩”，但是没有“败”。一个地方的乡村要活，农业就要活。农业如果不活，那么你在乡村赖以生存的产业跟其他产业就没法竞争。我们的问题是把农业越做越窄，整个中国的农业为城市服务的基本功能没改，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农业做得越窄，乡村就越衰，它跟前面的两个是相关联的。

第四，弱勢的乡村与强大的城市文明。这个是跟我们农民有关系的，本身乡村就一直处于一种弱勢的状态，然后从我们国家工业化以来，我们实际上是把城市的文明越做越强大，在一个非常强势的城市文明下，乡村文明就变得越来越弱小了。这样，对于一个农民来讲，他在乡村是毫无尊严的，在乡村就是落后。当有机会往城市、往工业区冲的时候，大家就一股脑地往城市冲，所以农民这个时候就不管其他了，这两个文明之间的势力对比太强大了！

另外就是代际差异引爆。“农一代”的时候还是以农为生，为“农二代”在乡村呆下来服务，但是“农二代”已经离去了，不回来了，所以“农二代”和“农一代”的代际差异引爆了整个乡村的这种变化。

我不反对人的城市化是一个趋势，但是乡村以如此衰败，我觉得这里面要找深层的原因：第一，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是被忽视的。你看我们现在花了那么大的功夫，这些年写了那么多的文件，但是我们还是在谈农业、农民征收的事，乡村本身应该怎么现代化却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第二，我们对农业的理解和对乡村功能的理解有认识上的失误，但也有政策上的惯性。农业到底是什么？在我们整个农业已经降得那么低的水平以后，我们还是那么一句话——“基础地位”。什么意思？到底农业是什么？你的农业还是粮食农业！一个是对农业的理解，第二个是对乡村的功能的理解，乡村到底有什么功能？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块也有严重的缺陷。比如说在政策向城市倾斜这么一个导向下，乡村就是该消亡，乡村是一个不该存在的、落后的东西。第三，对城市化的理解。认为“城市化就是所有的要素往城市走，只要城市化完成，现代化就完成了”。我觉得这个认识是有问题的，根在哪里？就是如何对待“两个文明”的共存，就是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到底如何共存？我们没有把这个事当回事，我们一直在强调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但是这两个文明到底怎么共存，我们却没有花功夫好好去思考。

第二块，现在怎么去复兴乡村？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很多人说：乡村到底要不要复兴？在我看来，在大的基本趋势下，肯定是有许多乡村会消失的，但是不能如此地消失。这一年我跑下来以后，我自己在慢慢琢磨，觉得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去做：（一）、要重新认识乡村的现代化。通过乡村的现代化是可以复兴乡村的，这就牵涉到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我们的现代化就是等同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那么城市化和工业化怎么来的？我们现在琢磨得也不够，我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就是掠夺乡村。但事实上，从几个例子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一定是以乡村现代化作支撑和前提，如果没有整个乡村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立不了根的，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看第一个例子，就是我现在讲的涪潭，我给涪潭的总结就是：它是在乡村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就是说它还是有路的，不是说城市化和工业化就能够把整个现代化都完成了，实际上是有另外一条路的，乡村的发展就是能找到的现代化的路。涪潭的特点是什么？我给它总结的就是三点：（1），持续的农村改革。（2），不强势的政府和城市。（3），乡村产业的发展。大家看，漂亮吧？这是涪潭。

图 11

1988年我们跟齐源老师下到涪潭的时候，当时涪潭极度贫困，1988年的时候那里人均收入只有70多元，那个时候老周同志就想搞“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改革，最后找到一个支持者，就是贵州省政研室主任李清，后来加上涪潭的书记华金河，三个人一拍即合。由头是什么呢？当时就讲了一套理由：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我们能不能把人口不增加来对农村有一套改革的推进呢？所以最后就想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个政策现在有很多人议论，事实上我们当时是考虑到没有了地以后，人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没有什么工业化、城市化的概念的，但是我们当时也算了，只要没地的人和不减地的农户之间是大致平衡的，这个政策是可以做下去的，就是增加的人口不再分地和减人以后也不减地，差不多算下来两者是平衡的，只要能平衡，那么这个制度就能撑下去。如果能撑下去，整个集体所有制就不需要老调地了。只要不老调地，这个制度就相对稳定了。事实上一直做到现在，整个涪潭没有再分地的人也就是12万人。在涪潭25年改革的时候，当时我就想到一件事：“为什么12万人没有分到地，也没人去造反？”原来

大家吓唬中央领导不就说无地的人会造反吗？他没造反的原因是在哪里？原因实际上就是两个，……（旁：12万人没分到地是当时还是现在？）就是一直累积下来，到目前为止。（旁：全县有多少人？）全县是100多万人，不，等下我再看看湄潭的数据。）反正就是这12万人没去造反，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这几个：1，你没分到地，但是你家里有地，老人的地留给下一代了，所以家内传递。2，大量的人到城市和工业上去，最后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地越多的家庭越穷，相反，人越多地越少的家庭，大家都出去了，收入却越高。3，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地，我们当时想到的路是什么呢？荒山拍卖。湄潭60万亩的荒山，原来是真荒，但是这些荒山荒了以后，如果有一个制度能撬动，那么农民不就有出路了吗？所以你看这些人就开发荒山。湄潭的乡村现代化是跟荒山的开发有很大关系的，最后就种了茶叶。开始“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到荒山拍卖，然后就是城乡统筹这一段也起了很大作用。就是把整个农村兜底的一些事，就是城里人有，农村人没有的一些东西，如养老、社保、医疗这些兜底的事在这一段解决。接下来就是土地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的经营，然后就是这一轮的全改，这样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改革的氛围。任何一个书记到了这个地方，如果不靠改革来撬动的话，这个书记基本上就是脑子有问题的人。它已经有一条很好的路，你只要改革撬动一下，改革是一环套一环的，你这一轮改革解决了一些问题，它就往前走一步，然后下一轮只要把新出现的问题它改一改，就又开始见效果了，所以你看改革不断地往前走，这是第一个。

第2，茶产业发展（规模化+品牌+茶市场）。湄潭现在已经有60万亩茶山，另外就是与茶产业相关的产值达88个亿。在整个湄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张培刚讲的“农业工业化”，它也是一个工业，它的整个农业的规模化，还有农业科技的投入和农业品牌的形成，包括技术、生产方式的组合，这些东西也是工业化。张培刚讲“工业化”是指什么呢？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湄潭就是因为有了荒山开发这件事，整个农业产业就跟其他的产业一样也在工业化，要素在不断地重新组合。另外，它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绿茶市场，还有一个就是在全国地级以上建立200多家专卖店，有国家级的“湄潭翠芽”、“遵义红”等品牌，围绕这些产业不断往前走。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不等于就是制造业化，农业本身是可以工业化的。

第3，乡村旅游与服务业的发展。就是说农民在地上有事折腾，而且折腾得还有效益。另外就是农村产业形成一个链条以后，整个乡村就有看头了，再加上湄潭这个地方温度特别合适，夏季非常凉爽，夏季你去湄潭，宾馆里面是不用开空调的，所以它整个产业延伸到了旅游业、服务业。去年到湄潭乡村旅游的人口达300万。重庆是火炉嘛，从重庆过去很近，尤其现在高铁通了以后，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这帮人天热的时候就到湄潭乡村去度假，在农民家里一住就是2个月，到今年为止，将近5000人。就是说，乡村本身是可以活起来的，关键是你的路数问题。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例子。

第4，整个乡村发展以后再城市化。你看我去湄潭，我们将近30年的时间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湄潭的农村越来越富，农村的经济活动越来越活跃，农民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但是城市非常破败，整个湄潭当时就只有5平方公里。当时我就问：“湄潭政府怎么不跟其他政府一样把城市搞一搞？它的原因是在哪里？”原因是干部呆在湄潭太舒服了，比如遵义没有合适的位置他不去，……（旁：湄潭40万人）所以，它的城市一直没有扩大。原因在哪里？就是这个书记没有那么大的干劲，四任半的书记整个30年就没怎么动。它的城市从什么时候开始扩大的呢？就是这几年的时间扩大10平方公里，原来一直没有扩，因为那个书记没有太大的动力去搞城市。但是，我这一次去湄潭发现城乡开始平衡了，就是城市到一定阶段以后，开始发展。当然，湄潭的乡村发展并不是脱离乡村突然发展起来的，它

是整个乡村有非常好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也比较高，很自然而然的，他到城市有这种需求，所以它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一个乡村发展支撑的城市化。

然后我们再看安顺，这是贵州的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政策集成打造的美丽乡村。安顺这个地方原来比湄潭更穷，像这么穷困的地方，如何有一个发动机起来是非常重要的。普遍贫困的地区如果你没有一个发动机来发动，它就一直是穷的了。我90年代一直往安顺跑，当时就觉得这个地方没太大的办法，但这几年去看安顺，我觉得它还是有非常大的变化：

第1，基础设施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这10年来是整个贵州非常大的变化。我有一次从安顺到贵阳，那天到安顺的飞机没有了，他们就开车把我们送过去，你看从安顺到贵阳这个地方的基础设施有多难？我数了一下，大概有100多个隧道，多难呀！但是它就是不断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好处在哪里？把大山里面的人跟外界的物理隔绝给打开了，这样他跟外面的距离就拉近了。另外，对外面的了解开始有机会了。所以，对整个极贫地区而言，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第2，持续的扶贫。从2017年开始，整个安顺的精准扶贫基本上就是以产业扶贫为主，当然之前的区域性的扶贫等等，包括很多的事，包括基础设施，这一轮又开始，就是持续的扶贫。我在安顺看了，觉得这一轮搞的“美丽乡村”建设跟原来的“新农村”建设有非常大的变化，原来的“新农村”建设就是物理上的，但这一轮我在贵州包括在安顺看到的“美丽乡村”它是带有文明程度的，它是带有乡村复兴层面的，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物理层面的东西。大家看它确实投了很多钱（我后面会讲），这一轮的“美丽乡村”建设累计几十个亿的投资，有一些村的打造花了很多钱，一个村几千万的资金。另外，我为什么讲它是有文明层次的呢？它不像原来“新农村”的时候我们去看，就是把你移到路边，让你刷墙，这一轮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你看它的民居特色，像安顺的屯堡、布依、苗族民居，它是有文化符号的！大家看这些村庄，这是一个屯堡（见下图12）。

这里还有一个戏，是讲朱元璋当时怎么带领这拨人到这里来的。就是说它不像原来那样大拆大建，而是在找它的整个民族的符号。第二个就是改水、改灶、改厕和改圈。这个可能是整个贵州这一轮工程最大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村庄要搞成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花钱的。第三个就是乡村治理，据说汪洋马上去湄潭看整个乡村的整治，就是治乱。第四个就是村庄基本的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还有一个就是基础设施。所以，大家看，是不是觉得安顺现在看上去很美了？（见下图13）它的美是异质化的，是地方特色化的，另外它带有一种乡村文明的复兴在找寻历史的符号，当然也包括一些基础服务的提供。

第3，黔货产业。就是说整个西部贫困地区或者中西部地区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整个农业的产业形成不了规模化的产业链条。它现在有非常好的地方特色的东西，云南等整个西部贫困地区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导致的垦植农业，这一轮我们在贵州去看，尤其在安顺，它的一个变化来自于需求变了，现在大家开始需求一些怪怪的东西，原来吃上大米就行了，现在可能是想吃某某地的某某大米。另外就是很多山货，山里面一些怪怪的东西，所以他们讲“贵州的东西好吃，质量高，但是不好看”，因为是山里面的东西，长得不好看，长得怪怪的。这一轮的需求出来以后，原来很多小规模的地方

化的产品开始有需求了，这是这一轮城乡互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大家看这是金刺梨，金刺梨是安顺大坝村的一个地方特色产品，长得很难看，但是它的营养很高，它的维生素含量高，最初这个东西被城里人发现很健康，可以治病什么的，然后就开始种植，现在安顺已经种了将近 30 万亩的金刺梨。但是种了金刺梨后，这些东西怎么卖呀？所以现在整个山区最大的问题就是小规模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很稀奇，规模扩大以后，卖不出去，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于是，大坝村的陈书记就想了一个招，跟上海的一个公司联手做加工。大家看，这全是金刺梨搞出来的东西，他们开始琢磨这个事。另外，粮经比的调整。粮食农业的调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在原来粮食是唯一农业的时候，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长不出来，最丑的和最先进的东西都长不出来。这里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安顺粮经比原来是 52:48，现在是 30:70，所以粮食农业概念的改变，对这些地区的乡村发展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另外就是改革。整个安顺基础设施也建设了，各种投资也有了，乡村也开始美丽了，产业开始有机会了，但最后就落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农民的内生动力，就是你怎么把乡村的资源组合起来？也没谁想着一定要去改，最后就是所有的其他生产力的东西都开始出现变化以后，生产关系就开始动。安顺的改革或者说整个贵州这一轮的改革为什么在农业经营制度上、在产权制度上在全国往前冒？我觉得当然一方面是和地方领导推动这个事有关系，但我觉得核心是来自于需求，产业的需求、农民的需求，另外就是整个大的变化出来了，这些变化出来以后，最后你的整个制度就要往上跟。整个贵州其他东西没有，现在好不容易产业机会出来了，甚至包括它的山水美丽以后，就有人来用了，接下来就是这些资源怎么组合？所以它做的一件事就叫确权、赋权和易权，但这些事还是刚开始做。为什么要“确权”？(1)，在一家一户手上，就是单家独户去打，很难。(2)，原来很多“公”的部分不清楚，越大，大家就越去侵公，就前面讲的像余江那样，越大，私的部分就侵公，这样你就惨了，所以安顺现在把所有的资源全部进行确权，然后再进行组合。确权的目的是：第一个，试图将原来一家一户手上的东西在组合之前把产权搞清楚；第二个，原来产权不清楚的“公”的部分通过确权，把这件事搞清楚。第二，赋权。确权以后这些资产到底怎么去衡量？就是你最后组合以后，这些资产到底值多少？所以大家看资产的评估，另外就是资产的抵押，然后接下来就是产权交易。当然，从遵义的这个案例来讲，它所给的启示就是：在极贫的地方要有一个发动机去启动，这个是需要有公共政策起作用的。但公共政策起作用以后，接下来就要找地方特色。大家看，安顺现在就有特色产业，地方特色的产业怎么样应对城市的需求？第二个就是美丽乡村真美，所以我就想：安顺的乡村美在哪里？它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它整个美丽的村庄是镶嵌在极美的山水之间的，可能全中国都很难找到这种美。它不像我们有些地方就是大集中，它是嵌在山水里面的，它就是一幅画，所以我觉得可能它就是另外一幅乡村现代化的蓝图。比如说一定的公共投资，把贫困的东西给洗掉，然后再开始更换面貌。乡村的变化另外就是寻找产业机会，再加上产权明晰，把活力调动起来，这可能也是一个路。

针对安顺这个例子，我提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安顺是 90%以上的村庄都在这么弄吗？对于大多数的村庄来讲，如果未来有很大一部分村庄会死亡，只有另外一部分村庄活的话，我们要不要花那么大的代价全部给弄活？

第二个问题，你的产业能不能弄起来？

第三个问题，人回不回得来？最后你折腾了半天，这个村子要复兴是要有人回来弄的，无论是产业还是村庄，你要活起来，人能否回流？从我们现在在安顺看到的情况来讲，它是回流的迹象，包括塘约村，塘约村现在差不多回来了百十号人，但能否持久？另外，我前



面讲的那个规律，“农二代”往城里冲，你花那么大的精力来弄（宣传）美丽，他回不回到这个美丽的地方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四个问题，产权安排是否经得起历史和事实的检验？整个安顺这一轮的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在我看来是具有挑战性的，就是原来以家庭为基础，整个基本的经济活动以农户为单位，现在集体重新组合资源以后如何合作？另外，合作以后如何解决合作里面的一些历史上的老问题？现在这些问题也开始出现了。再就是村庄企业家在整个乡村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我去到安顺看到好些村庄都是有一个能人，没有能人的村庄就起不来。换句话说，你这么想把所有的村庄资源都组合起来，但组合起来没有一个人带领是有问题的。另外就是没有找到合作的安排可能也是会有问题的。

第五个问题，典型有没有可复制性？比如安顺现在就是要把塘约的经验在全区推广。

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看松阳。松阳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全松阳范围内古村的活化来引领乡村复兴。这是松阳的路。在我看来就是三件事：第 1，主政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第 2，艺术家的引入。第 3，靠古村活化起头来带着全县复活。大家看，这个美丽吧？他为什么干这件事？因为丽水穷啊！而它要工业化的话，它拼不过其他地方，最后他找来找去，它有历史，建县 1800 年。另外，它有 100 余座的古村落，现在有 71 个国家级的传统村落，这在全国是少有的。也许你会想：“这么干下去会穷得不行的”，但是带着它跑的就是古村落。而我讲的就是王俊，他说：“这个地方如果要搞工业化，大规模地引资招商，肯定死”。另外，他说：“我有那么多好东西，不把它挖掘出来太可惜了！”王俊这个人很有意思，我那天到了以后，我们聊了快 4 个小时，他根本不放你，就在那儿聊，讲他的那些东西，他觉得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通过复兴古村来复兴整个乡村，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理念。王俊是 1962 年出生，他在丽水呆了很长的时间。现在我们的干部在一个地方只干两三年，他才不干这事，招商引资招两个项目就走了，干这干嘛呀？王俊因为在松阳呆的时间很长，另外他这个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然后来的这些人全是王俊找的，他一个一个去谈，一个一个去说服。原来这里一无所有，大家看这是浙江的，这些人全是靠在松阳作的项目拿了世界级大奖，国际最牛的大奖全在松阳产生。

大家看，这里面有好多我都见过，大牌的教授全在这里做着试验。这个我给大家放一下就行了，这是黄老先生，另外清华同方也在这儿做，而且这些人不是在这儿说两句就走了，这些人是每个人都在这里做了的。大家看这是云上平田的民宿改造，原来的破村子，这是他们做成的，一看就是艺术家干的。

图 14

这是“麒麟山居”，（图 15），全在山上的，你看它基本保持古风，但是很现代。

这是“阳家堂”，这些我就不给大家放了，这些客栈你去晚了就订不着，看着都土里巴几的，但是火得不行。当然这里面我就不讲了，就是“乡村复兴”。

图 16

王俊相信通过生态的恢复和古村的保护是可以让乡村复兴的，这是他给我写的（见下图 17）。

“两个手法”：一是“最少、最自然、最不经意，最有效的人工干预”。二是充分利用本土原生态、低碳环保材质和废弃建材、生态环保技术。这是他写的，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因为没有时间了。大家看，这些艺术家在那里。（图 18）

另外就是做到“三个维持”：维持原生态的田园风光，维持原真的田园乡村风貌，维持原味古朴沧桑的历史。就是这些东西不动，原来的机理不动，但是把它现代化。大家看，这是它的田园，还有牛、马，这些东西在我们老家都被杀掉了。你看这是它的古村，保持和发展并存。

王俊的这个搞法是他的一个理想，但我这里就提到几个问题：

（1），其他地方的乡村在复兴的时候，古村改造的资金哪里来？王俊现在是赶上时候了，各种资金、各种项目往这里堆积。就是说，任何一个地方你的历史遗迹要复兴起来的时候，资本来源如果不解决，那么你这个地方就起不来。另外，资本来源非常重要的就是资本的投入是有利可得的，但靠各种项目的资金来做的古村改造能不能撑得住？

（2），村民都干什么？非常要命的，就是你去看松阳，你开车到了这个地方，发现了艺术家们干的活，但是边上老百姓该干嘛干嘛，这“两张皮”你怎么解决？最后就变成什么？松阳确实有很多美丽的点，但是这些点是艺术家在这里创造的，跟整个村庄怎么现代化，……。现代化的某个点是否代表整个乡村的现代化？

（3），规划控不控得住？你现在去看，人是不断地往松阳涌，它确实是火起来了，但是火起来以后，接下来就会面临其他大多数地区美丽山水和古村改造所面临的问题，你的规划控不控得住？比如说让徐甜甜来干，那我农民要干，行不行？所以这种规划一旦立起来以后，你控不控得住？

（4），地方领导换了怎么办？王俊走了怎么办？王俊走了来了一个老李，老李说：“这是啥破玩艺儿？搞那么一些东西。”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类。

第二类就是通过宅改促进村庄转型。宅基地跟村庄是紧密相关的，如果宅基地这块不往前推，那村庄就很难往前走。宅基地制度的特性我这里就不讲了，因为爱民处长也在这儿，它是无偿分配，以成员为基础，外村人不能进。另外，宅基地主要就是居住，没有兑现你的财产权。就是说，村庄跟宅基地是唇齿相依的，你的整个村庄是盖在宅基地上的，所以这里面就面临几个问题。我们看余江，余江在之前是破得一塌涂，这是宅改以后，……。宅改的几件事：一是地基调查，先把权属搞清楚。另外就是宅改以后，一户一宅的，我给你发证，一户多宅的我只给你登记，但不发证，这就是合法和法外的问题。二是规划引领，多规合一。三是乡村规划。这是整个乡村的改造，另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它不是干部直接下村去做，它有一个理事会，这些理事会员有些是从外村回来的，出了钱的，有些就是村里面有资历的老人，所以宅基地改革所有的事基本上都是理事会在做。这次他的一个局长来了以后，当时我看他的劲头很足，我说：“这件事你千万别自己弄，你让农民自己弄。”后来他在大会上说：“我们的主要创新就是群众自己搞。”另外就是宅基地的有偿使用，这我就不多讲了，因为没有时间。另外就是住房做分类保障，还有就是无偿和有偿相结合推出。最后一部分宅基地是要退出的，现在收有偿使用费 4 千多户，600 多万元，退出 100 多万平米的宅基地，有偿

退出的 46 万平方米，大部分是无偿退出。

宅基地改革我要给大家举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安主任带我们去看的房山区，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很破的村子——黄山店村，它是怎样的呢？这个地方有很美的景，但是最后怎么兴起干这件事？就是北京把原来郊区的这些土项目都关停，关了以后这个地方就没有机会了，接下来就是开始全村搬迁，把原来 300 多处宅基地有偿收回，然后集体开发。但集体开发以后给农民的补偿是以每人 40 平米，每平方 400-800 元给予补贴，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以后，村里面再统一开发。管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开始村庄自己搞，没市场，房子盖了，但没人来，因此农民也没法分红，最后就是引进“远方网”。“远方网”给它作市场运营，对外销售。另外，很多项目的形象包装实际上也是由“远方网”提供的，而且公司跟村庄之间以 5:5 的比例分成，所以这样一下子就搞起来了。这个案例说明外面的资本如何进村是非常大的一件事，现在也是到了每晚将近 1000 元，现在已经改造了 30 余套。大家看这个管家婆婆就是本村的人（见下图 19）。

第三类，村庄转型跟农地制度的转型是配套的。农地制度转型的配套我觉得核心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原来一家一户手上的承包地怎么释放出来？原来在一家一户手上，大家每家每户种，现在人都走了尤其是“农二代”走了以后，原来的承包权怎么释放出来？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第二件事，谁来种？这就牵涉到我们未来的整个农业经营制度的主体问题。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是看松江。松江的家庭农场，这个地方主要是工业化，只有 3% 左右是搞农业的，所以它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承包地集中到村集体。原来地不是分到一家一户了吗？现在是把承包地集中到村集体，之后村里面通过一个程序来选种地的人。那么谁有资格来种地？只有本村的人才资格。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农民进城以后，原来松江的地主要是由安徽人种，但是安徽人种一阵以后，他们讲“这个地种得就不成”，另外就是粮食没人种了，都去搞蔬菜这些东西去了，但是松江又是上海的粮食安全主要产区，它必须种粮食，最后他就把整个地收到村集体，由本村人来种。本村人种面临的问题就是原来的承包地是在一家一户手上的，现在收到集体以后谁来种？按道理本村人都有资格种地，因此就有一个程序来选种地的人。选种地的人以后，再就是把土地做到适度的规模。这个地方最初就是 80-150 亩，现在已经到了 250 亩。他们算了一下，到 350 亩左右的适度规模以后，这个地方基本上可以不用补贴了。另外就是整个农业种植的农资，粮食的销售基本上是由政府指定的公司统一供应农资和收购。还有一个就是农机，因为专业化和规模化以后，最重要的就是农机，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家庭农场之间农机互助。另外，这些农机的维修和培训由一个公司来承担，这就可以解决农机的的问题。所以，大家看到整个松江的结构就是专业种植，就是一个村的地集中在几个农户手上，一般就是 200 亩的地，一年有二、三十万的收入。他就专业搞农业，不搞其他的了。也就是说，松江最大变化就是农业真正成为了一个体面的、可以跟其他行业抗衡的一个行业了。

农业如果不体面就没人干了，但是农业要体面，非常重要的就是：1，你的收入；2，农民觉得干这件事是值得的；3，要有新的人进来。大家看这位女士快成明星了，现代人都特别会说话，她本身不是搞农业的，原来是她爸爸搞农业，后来她接手过来了，她原来在城里上班。

图 20

第二个例子就是成都崇州。崇州也是面临“地怎么集中过来”的问题，原来一家一户的地怎么集中过来，崇州的办法是什么呢？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最初崇州的地都是给公司种，就是它搞“三集中”，搞“三集中”以后面临的很大问题就是地给谁种？最初这个县的地全是给公司在种，但给公司种的结果是什么呢？我第一 year 去，那个书记每次都给我讲“三集中”，就是地给公司种以后，农民的工资也上去了，农民可以在这儿打工，地租也上来了，因为老板来了以后，地租就提到了 1000 多。但是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二年我去看时，这个书记愁眉苦脸的，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些老板全跑了，现在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农民就在我的办公室堵门，找我要租金，我哪有租金给他？”最后他就股份合作了，就是把原来的地又重新收回来，以村为单位股份合作，把土地折股，成立股份合作社，把土地集中起来。集中起来以后由股份合作社选专门的人来做，所以崇州市叫“职业经理人”。就是说专门由一批有经验的人来种地，但我这次去看，职业经理人已经开始年轻化了，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开始专门来种地了。选职业经理人来种以后，比例是什么呢？就是投入和销售基本上就是农业成本的计算、投入由谁负责？由股份社来做出，但是具体的经营就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实际上是一个帮股份社种地的人。他做的一件事就是让种地这件事开始专业化，但是决策在哪里？多了一个组织——合作社，所以最后的收成是职业经理人跟股份社一起分。这个制度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农业生产的利润撑不撑得起你的那么一套组织？原来是一家一户种的，现在你又搞出一个股份社，还有几个管事的，而那些人还去看着职业经理人种地，然后还要讨论到底是二八还是三七分，这就搞复杂了。但好处在哪里呢？就是种地的人独立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这样：他跟职业经理人之间每年会讨价还价，他说：“你一年没干多少事，你干嘛要拿那么多？哦，那就再少一点。”少一点后，职业经理人就就说：“你只给这么多，那我就扩大规模，我就把张家村、李家村的地也弄过来。”

因此，我觉得这两种制度现在都处于探索的过程中。这两个案例说明农业经营的路子在往前推，但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1），原来在一家一户手上的承包权你到底怎么去弄？（2），未来整个经营的主体怎么样才有生命力？（3），这套经营制度地探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牵涉到现在小农手上的地要放出来，难度非常之大。我这次去梅河口调研，梅河口采取的办法是什么？把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分成两个证：承包证和经营证。意图是什么？就是新的主体拿着经营权去抵押贷款，但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让农民把经营权拿出来，农民却不肯拿。农民说：“这个东西我不能给他，我给他，如果他拿着这个经营证贷款，万一他出事，跑了，我怎么办？”所以把这两个权分离道理上是讲得通的，但是这两个分离的难度尤其是牵涉到我们现在几亿小农权利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事。（4），村庄主体与村外人的开放。最后整个村庄的现代化可能主体还是农民，还是村庄，但是它必须要对外开放。

因为时间的问题，最后我就给大家讲几个结论，我这一轮走下来，开始是非常焦虑的，但是跑到村庄以后，应该说心情是越来越舒畅了，我的一个总体判断是：现在乡村总体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我的第一个结论就是：

第 1，我们既不要故作忧虑，也没必要矫情地去找乡愁，这两个都是非常要命的。一个就是说你去忧虑，而忧虑有很多都是属于趋势性的东西，人走的是趋势性的东西，另外乡村的很多变化也是趋势性的东西，你忧虑没用的，这是规律。另外，找乡愁，我觉得也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知识分子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找农村的乡愁，但乡愁光靠知识分子是愁不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矫情。

第 2，大部分乡村的衰而未亡与部分村庄的活化是城乡发展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我们可能要抗争个几十年的时间，大部分村庄是衰而未亡，另外少部分村庄开始活化，这些村庄的活化就是城市的需求带来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结论，大部分乡村可能就是这样的。

第 3，绿水青山在很多地方就是绿水青山，有部分会成为金山银山。未来会慢慢变，而在慢慢变之中人就慢慢走，走的结果就是这些地方你去看的时候心情就会非常好，它就是绿水青山，但只有部分的地方会变成金山银山，所以你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绿水青山的村庄都变成金山银山，变不成的，可能会变出问题来。

第二，我觉得公共政策的重点要放在让哪些活和如何活上面。衰亡和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有很大的空间让公共政策去做的，这里面重点就是几件事：

（一）重新思考城市和乡村文明。中国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应该是进到这两个文明都开始有自信、平等发展的时期。城市文明离不开乡村文明，城里人尤其像我们，在城里呆久了，你呆得住吗？你是需要去那个地方换空气、换心情的。另外，乡村文明也需要城市文明，乡村的人往城市走是必然的趋势。所以，我们未来的公共政策应该把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平等的、共存的、文明的来对待。

（二）我们现在一定要思考由代际革命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这样一个问题。乡村是一定要现代化的，但是这一轮乡村现代化的独特性在哪儿呢？它不是简单的乡村复古，也不是简单的乡村现代化，它是代际革命带来的，就是“农二代”和“农三代”对待乡村的这种观念引发了整个乡村的农业现代化。因此，未来的乡村现代化我觉得有两件事：第（1），现在整个乡村的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对整个现代化的作用我们是需要弥补的。如果没有乡村的现代化，那么你的整个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就是说要弄清乡村现代化跟整个群居工业现代化的关系。第（2），这一轮的乡村现代化一定要考虑代际差异。我觉得代际革命，就是“农二代”对乡村的观念，他跟乡村、土地的关系可能是决定我们整个乡村现代化走向的关键。第（3），村庄的转型必须有宅基地改革来作为牵引。整个村庄要动，无论是死还是活，它都会需要有一个东西来撬动，光靠财政制度、特殊优惠是没办法让村庄活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村庄转型非常重要的就是宅基地改革要有突破。宅基地改革的主要突破在哪里？就是让村庄该死的死，该活的活，而我们目前整个这套宅基地制度基本上是让村庄衰而未亡，另外就是让村庄能活的也活不了。原因是在哪里？就是它基本上是以成员权为基础的无偿分配。“以成员权为基础”，结果是“不要白不要”，其实就是“我”占着这个东西，但“我”并不在这个村庄用。这样，这些村庄就不可能不死。另外，整个宅基地不能作为一种财产来处置，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我还继续占着，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死”。第二个就是村庄的“活”，村庄的“活”，宅基地制度可以起很大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宅基地真正作为一种财产权。第二个就是宅基地的改革一定要让适合的人走，另外就是外面的人可以进。如果你靠身份把整个村庄封闭起来，最后很多该活的村庄也活不了，所以我觉得村庄转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就是宅基地制度，就是宅基地怎么往前推，我觉得这个现在需要进一步的制度设计。第（4），村庄的变化是跟整个农业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整个农地权利结构的设计、经营制度的设计最后怎么样带动、整合农业转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步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这次来主要就是展示图片的，还是占用了那么多的时间，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 张静：

好的，谢谢守英教授！因为这个问题比较重要，涉及到很多未来农业政策的战略性设想，所以我们邀请了三位于议人和两位特邀嘉宾。三位议人是：周飞舟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另外是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第三位是安钢，北京市人大农委主任。两位特邀参与讨论的嘉宾是：张红宇，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第二位是宋洪远，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我们希望由专家 and 实际政策甚至是实际工作部门富有经验的人来共同来参与研讨。好的，那么首先有请飞舟教授，每个人十分钟左右，最后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供讨论。

## 周飞舟：

谢谢张老师！谢谢刘老师的演讲！学到了很多。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演讲，全是照片，所有的结论来自于现实田野的调查，非常之鲜活，非常有说服力。另外，这一年来刘老师本身的思想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从纯粹的研究部门来到大学，所以可以看出来刘老师的观察和思考正在脱离一个纯粹政策研究的视角，这背后有一些大的理论关怀，比如说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他谈的虽然都是政策问题，但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关怀，就是中国式的城乡互动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意识促使着他得到这样一些东西。我谈不上评议，只是一个理解，因为我个人也作过城镇化的研究，我从社会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政策的角度来谈一下我对刘老师谈的这几个核心问题的一些想法。

关于农村城镇化，各个学科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这就是农民走了之后，村庄向何处去？我这个暑假在石家庄的郊区作调查，感受跟刘老师很相近：村庄衰败得非常厉害。村庄会不会一直衰败下去？这是涉及到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道路的核心问题，刘老师的回答我非常同意，我也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判断。一个大的判断，是当前人口外流的趋势呈现出一些重要的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他讲的“回乡不回村，买房不盖房。”中国的人口流动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地迁移，而是一个来回的流动，这个流动表现出很强的代际差异的特征。其实正是人口回流的这样一个特点，揭示出了村庄未来的状况是什么。刘老师讲的我把它理解为三个大的方面，这三个大的方面就是未来村庄会怎么样的答案，当然这三个大的方面都是建立在刚才那十个字的大判断的基础上。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农村产业。刘老师用张培刚先生的话，叫“农村工业化”，其实照我的理解，这就是农业产业化的一个问题。农业产业化我就不具体讲了，它的方面非常多，刘老师谈了一些，比如说经济作物、乡村旅游、各种各样的来料加工包括淘宝村等。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模式向乡村延伸得非常多、非常厉害，在农村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产业带，这些产业是以老人和回乡的四五十岁的人、家庭妇女为主要的劳动力，他们的特点就是廉价、成本低。所以，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都集中在乡村，比如说淘宝村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我想接着这一点谈下去的就是，农村产业带的发展比如说茶叶种植、淘宝产业等等，这些东西和农民的居住模式、农民的买房模式有着复杂的关系。其实这是我前一段一直在研究的问题，我在恩施作调查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茶叶的产业化，那个地方的茶是富硒绿茶，经过了大概十多年，发展得非常好。随着茶叶产业的发展农民的居住模式也产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如果我们家种茶叶的话，那么我住在哪里？我在哪里买房？我外出打工有什么规律？因为茶叶有季节性，所以这和劳动力的外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的发现是茶叶种植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有集中居住的趋势。茶叶生产是一个特别长的链条，包括茶叶的收购、茶叶的粗加工、精加工，茶商就会居住在乡镇或者是县

城，加工厂就办在县城或者是小乡镇，收购点会在中心村。这是我拿茶叶来举例子，就是说，茶叶和农村地区农民的集中、买房行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背后这些细致的关系是我们谈“村庄向何处去？”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是刘老师讲的一个方面——农村产业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政府的公共投入问题。这包括政府的投入，也涉及到乡村的未来、农村城镇化有关的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在下面作调查，感触也是非常深。农民在哪里买房、在哪里住、在哪里建房，都是和道路、学校、医院特别有关系。中国的农民在北京打工，不在北京买房，他也没打算在北京买房，他是回家给儿子娶媳妇，最早的时候是盖房，现在是买房。买房在哪里买？我把它叫“层级分流”，就是它是分层的，钱少一点的在乡镇上买，钱多一点的在县城买，更多钱的就去中心城市买。买了也不一定住，但是必须得买，农村婚俗的习惯已经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在很多地区不买房已经娶不了媳妇了。另外就是和教育有关，人口集中居住的模式就是和学校、和孩子上学有关的。这个问题我就不细讲了，它和户口和你买没买房、在什么地方买房与你孩子在什么地方上学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这些东西都是和政府的公共投入政策、公共设施建设极其有关。所以，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未来的乡村是不是衰败，是不是衰而未亡，还是说有些乡村能够复兴，其实是和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尤其是在公共服务方面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是刘老师谈的第二个大方面。

第三个大的方面，其实也是学术界研究得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资本下乡或者资本进村。刘老师讲的松阳就是一个例子，资本下乡、资本进村。现在由于政策的限制，大部分的资本都投入在农业，搞现代农业，这个是非常失败的。我们社会学作过很多的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吗？我觉得有，但成功的少，其中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资本被严格的局限在种植业，它受了特别多的限制，以至于它最后经营还是亏本的，这也是刘老师最后把结论放在宅基地，还有农地制度改革上面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这也是谈中国乡村城镇化道路的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如果要摆脱乡村的衰败进程，除了刚才讲的农村产业和政府政策的投入之外，其实第三条特别重要的道路就是城乡互动，就是城市文明、城市资本、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理念如何进入乡村。城市是单独成立不了的，就像刘老师刚才讲的，我们在城里呆久了，我们也想去乡村一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是城市的资本、城市的文明、城市精神怎么和乡村结合、怎么和乡村互动，我觉得这是下一步政策研究和研究特别重要的内容。目前城乡互动只局限于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去城市，然后他回到乡村，把一些城市的理念、城市文明带回去。我觉得只靠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有城里人或者城里的资本真正下乡。这是刘老师讲的这三个方面给我的启发，最后我想讲两个小点，我和刘老师讲的重点有点不同：

第一，刘老师强调了代际差异，我觉得一方面要看到代际差异，另外一方面还要看到他们相同的地方。什么意思？中国的农民家庭有很强的家庭生命周期，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他的行为模式是不同的，但是在相同的年龄阶段，他的行为模式就是相同的，或者说主要是相同的他20多岁的时候想变成城里人，30多岁的时候就是养老婆、孩子，到4、50岁的时候他就是要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他会回到父辈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其实农民工出来从事的职业有非常明显的代际特征，20多岁的时候他在服务业，30多岁的时候进工厂，4、50岁的时候去建筑业。为什么是这样？背后有一些社会学的因素。

第二，我觉得除了强调县城，还要强调小城镇的作用。小城镇对于城镇化的重要作用是因为它和农村产业的繁荣特别有关系。农村的产业带都是跨村的，但是一般都不出乡镇，所以我们说“一村一体”有点过于理想化，但是“一镇一体”，几个村形成一个产业带这个特

别重要，这个产业带核心的枢纽就是小城镇。就是说小城镇即使不作为一个居住的中心，它也是产业的中心。我觉得这一点学术界在谈的时候不够重视，我就是特别强调一下。

我就作这么一点补充，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刘老师指正。谢谢大家！

### 张静：

谢谢飞舟！下面请朱启臻所长来作评议。

### 朱启臻：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教师，在农民问题研究所工作，长期从事乡村、农业与农民的研究。感谢守英教授作了一个让人们深受启发的报告。守英教授的报告，从乡村现状描述到乡村衰败原因的分析，再到解决乡村问题的对策和思路，做了有见底的系统阐述，特别是对一些发展得好的案例的分享，给人们展示了乡村不必然衰落的前景。受此启发，我想补充一点内容。想说的是乡村衰落的事实，并不全是农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年轻人大都向往城市生活，希望离开乡村到大城市去生活和工作。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说，工业化、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也就是说，乡村衰败是必然趋势。因为大量的劳动力从乡村转向城市、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记得有一年去日本北海道，在那里访谈农民生活，农民住得非常好，祖上传下来的房子有一大片，各种大小农机具数十件，收入比日本的教授还高。但是小伙子到了 37 岁还找不到老婆，为什么娶不着老婆呢？他告诉我说，女人们都喜欢到城里找对象，不愿意嫁给农民，看来这是确实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但是在中国，与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在于，乡村衰败还有一系列的人为因素，某种程度上说是农民无奈的选择。也就是说离开乡村并不是农民必然的选择或者不是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刚才守英教授讲到了乡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发展权不同，但他没有展开讲，就是说在城市和乡村人为地设置了不同的发展机会，你想进一步发展吗？那就到城市来，只有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观察发现，目前有几个东西是人为促进乡村衰败的重要因素：

第一，就是撤点并校。当然撤点并校的初衷是因为乡村儿童数量减少，难以撑起一所像样的学校，因此为了让乡村的儿童接受更“优质教育”，就让他们离开乡村，到镇里或者县城去读书。先不论这个好心能否得到决策者想象的那样的好结果，这个做法到了基层就变成了“强迫”老百姓“城镇化”（实际上是要老百姓到城市买房子）的手段。最鲜明也是最露骨的口号就是：“小手拉大手”，先把儿童搞到县城去，利用中国人望子成龙的传统，再通过孩子带动大人进城。“小手拉着大手”动机是让你到县城买房子。于是，农民没办法，为了孩子的前途，选择进城买房子吧。在乡村调查时发现，很多年轻人全家离开乡村，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孩子读书。这样，乡村衰败成为撤点并校的理由，撤点并校就成为乡村进一步衰败的原因。

第二，宅基地对农民建房的限制。限制农民建房是促进乡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理论上的“一户一宅，无偿分配”，早就被实际上的不批宅基地废止了。大部分地区是你爱几户几户，村里已经没有给你宅基地的权力。在松阳调研的时候，我们调查了古村落保护，因为宅基地的限制变得保护和开发都非常麻烦。集体经济时期实行一户一宅的制度，但由于农民穷，盖不起房子，三个儿子就挤在一套房子里，现在儿子长大了结婚生子了，还是这一套房子，新的宅基地又不给批，只能离开乡村到允许买房的城镇去吧。三个儿子拥有的这套房子，



外表看着非常漂亮，但啥也弄不了，因为三个儿子的房子，一人就那么一小间，意见很难统一。古村落的保护和利用都成问题。

有些城市，由于总是惦记着农民的宅基地，不断扬言要拆掉所有村子，于是农民建房就受到极大限制，甚至农民想加盖一层房子就是不批，担心增加拆迁成本，这种规定甚至延伸到了深山区。宅基地限制以及对农民的建房限制，客观上逼着农民离开乡村。我前天刚从安徽一个著名的典型村调研回来，心里很不是滋味，乡村肌理都消灭了，把农民集中起来住排排楼房，农具没地方存放，农业难以为继；农家院落没有了，庭院经济也随之消灭，想搞乡村旅游、农家乐、田园综合体，都失去了基本的条件。这样的村还是乡村吗？能发展产业融合的现代农业吗？还能像总书记讲的那样“系得住乡愁”吗？结果只能是农民不愿意待在乡村、不愿意种地，这反过来又称为拆村的理由。我们必须反思这些教训，重新认识农民宅基地的重要价值，它是农民的生活空间，也是重要的生产空间，庭院经济、乡村手工业很多是凭借农民院落而存在的。农民的宅基地同样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维系乡村文明的重要条件。千万不要把它简单地定义为什么“集体建设用地”，还占补平衡，一拆了之。对宅基地功能认识的缺陷和对乡村价值的理解已经成为人为促进乡村衰败的重要因素。

第三，撤村并点已经到了可怕的程度。特别是结合精准扶贫政策，整村拆迁、甚至整乡拆迁，已经到了非常肉麻的地步。该搬不该搬的统统搬，非常可怕。我们说，移民搬迁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措施，那些生活在深山区、荒漠地带、石漠化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村民，靠当地资源没有办法改善生活摆脱贫困，通过易地搬迁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是十分有效的，也会受到村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受到土地挂钩利益的驱使，把大量可以在当地脱贫的乡村也强行搬家了，结果本来农民可以靠当地资源解决温饱问题，再加上政府扶持可以实现产业脱贫的乡村，搬到了一个完全没有生计，只能靠低保维持生活的环境。

我在一个地方调研易地搬迁，人家在跟我介绍经验时，首先讲了“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啥资源都没有，道路不通，水源缺乏，土地零碎，儿子也娶不到媳妇等，自从搬了家以后，人人都讨到媳妇了。”我一听，易地搬迁真的好啊！可是下面又接着给我介绍：我们要把搬出来的这块地用好，投入几百万通了公路，投了几百万修了自来水和小水塘，整理了土地，解决了灌溉问题，要把它建成田园综合体，使之成为高档的度假村。我只能无奈地告诉他说：“领导，你以后再介绍经验的时候，最好把这两件事分开介绍。如果来了研究扶贫的，你就讲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如果是另外一拨开发商来了，你就讲这方水土如何可以养活一帮富人。”当时他对我说：“像你提这样问题的人还没有遇到过。”我就和他们讨论，如果给农民也把路修好，也把水修好，把土地平整好，农民还会搬迁吗？当然不会！我们能说这样的乡村消失是农民自由、自愿选择的结果吗？因此，如何在实践中真正理解和落实总书记强调的“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仍然任重道远。

第四，土地的规模经营。农户经营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正是这一创造，不仅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且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远远不断的活力，直到今天。所以，稳定承包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成为中国农业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小岗村时强调，在小岗村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们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崇尚让农民变成既拿地租、又挣工资的人，以种种理由让农民把土地流转给“大户”，而且极大地推高地租，结果农业变成了排斥农民的产业，农民拿地租，或外出打工，或无所事事，加速了乡村的衰败，也使得农业“大户”经营苦不堪言。其实，这些做法完全误解了现代农业的含义，也没有很好理解总书记“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指示。农业的发展必须坚持

农户经营，农户经营的问题要通过制度创新，营造家庭农场的成长环境来解决，家庭农场是可以全部保留家庭经营优势，又可以部分地克服家庭经营弊端的最为符合农业规律的组织形式。家庭农场的培育是既可以保障国家农业安全，又可以保持乡村活力的农业经营主体。任何排斥农民的农业，既违背农业发展规律，也有害乡村健康，最终损害国家的农业安全。

第五，教育与社会心理的作用。乡村衰败也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社会心理和教育有关。千百年来，我们又“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是围绕“远离农村、远离农业”而展开的，“不好好学习，就当农民”，是乡村家长、老师激励孩子学习动机的最有效的口号。人们骨子里渗透着一种观念，没出息的人就当农民，甚至只要与农业、农村有关的人都会被认为“低人一等”。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即使有人想当农民，都不敢回家当农民。记得前年河北哪个大学的一个学生要回家养猪，他爹就喝农药自杀，以示抗争。说：“丢了祖宗的脸！”因为我们的文化教育和媒体宣传都告诉人们同样的信息，通过读书远离农业和农村是成功人士的标志！直到今天，这一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存在着，成为乡村衰败的社会心理催化剂。有些美丽乡村建设，也往往以脱离农业为荣，为整个村庄没有了农业而自豪。不仅如此，一些地区还在一定范围内成功营造出了文化氛围：乡村人只有在城里买了房子，才能娶到媳妇。我看到过很不可思议的一幕：一对夫妇，结婚不久，提着米、菜到县城过周末，我问他们的职业：在乡村种菜和养羊。为什么到城市买房子呢？当时在县城没有房子就娶不到媳妇，房子岂不成为负担？留着以后孩子们住吧。这样的社会心理支配下，乡村怎么会不衰败。

第六，城乡缺乏双向的流动。过去我们的政策是限制农民进城，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割裂的城乡之间的关系。今天又出现另一极端的倾向，单方向的城镇化，各种力量指向让农民放弃耕地、宅基地，进城购房，以此作为城镇化的指标。同时限制城市人返乡，切断了他们返乡的路，无疑限制了乡村的发展。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些乡村从衰变走向繁荣，是因为乡贤返乡所带动的，有时一个能人就能带动一个乡村的复兴。这个能人往往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企业家、官员、或知识分子，他们利用自己在外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管理经验，还有资本，凭着一腔乡土热情和情怀，重新为乡村注入活力，带动老百姓致富，重塑乡村共同体。乡绅制度植根于乡土社会，告老还乡是中国乡村传统，乡绅作为体现儒家道德规范，实施知识教化的有威望群体，通过维护伦理、劝课农桑、纠纷调解、扶贫济困、协调村落公共事务等，保障乡村有秩序运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乡贤是指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在目前乡村价值规范体系坍塌的情况下，新乡贤的核心作用在于凝聚乡邻，以道义整合利益，发展出在新时代下适应乡村发展的共享价值规范体系。因此，不要切断人们返乡的路，给包括市民在内的新乡贤下乡、返乡留下一条路，将是乡村复兴的重要举措。

乡村有其存在的理由，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有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相信，只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为乡村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而不是人为遏制，乡村不仅会复兴，而且变得会越来越美好。

**张静：**

谢谢！我们有请两位特邀嘉宾作评议，先请张红宇司长。

**张红宇：**

很高兴参加守英主讲的研讨会！以前经常跟学术界打交道，在政策法规司担任司长多年，主要的工作还是跟学界打交道，研究问题、分析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但在经营管理司担任

司长以后更主要的工作是由原来的调研变成作为决策、作为直接书写文件的起草者、参与者。我 2004 年以后一直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到最近几年因为相关的工作，对照要求，把专家、学者的观察、思考变成我们党的相关政策。听了守英的介绍包括安主任、朱教授、周教授的发言，我有个很强烈的感受：我们这些年确确实实在研究问题、思考问题方面恐怕还是有重大的欠缺，总是一直讲“三农”、“三农”。讲得都非常的全面、准确，中国要强，农业必须要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要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要富。总书记去年、前年在视察吉林的时候又讲“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掉农民，淡泊农村”，三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指示。但是，从文件角度来讲，从出台的相关政策来讲，比如我到经管司担任司长以后，从我从事的工作的角度来看，农业、农民问题聚焦很多，2006 年出台了一个新农村建设的文件，但是新世纪以来真正聚焦农村的，如果说新农村算是一桩的话，那么是十四种品牌。今年的一号文件主题是两个：

一个标题就叫《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换句话说，十四分之一是聚焦的农村，所以今天给我的启发很大。我到经管局担任司长以来，接近 7 年时间，一直讲“三条线”：一条叫土地制度、一条叫经济制度、一条叫产权制度，围绕这“三条线”，按照中央的要求，农业部会同相关部门起草了 6 个中央文件，这 6 个中央文件都落在了经营管理司，都是这三条线上的东西。一个是土地的经营权有序扭转，2014 年中办发 61 号文，一个是去年 10 月份下发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第二个关于经营制度最重要的文件是今年 5 月份中办发《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然后还有一个，按照中央的要求，刚刚会同发改委、财政部出台的关于围绕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文件，这也是聚焦的经营体系。第三个就是产权制度改革，一个是 2015 年《关于失地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一个是去年 12 月份下发的中央最重要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那叫里程碑式的文件。我讲这三个方面的意思是，农业、农民问题尤其农业问题关乎着很多农村问题，确实相对淡泊，所以对总书记三个思想的全面贯彻落实，我以为从学界、理论界到政策界都有欠缺。守英知道，我为什么今天坐了一上午，一直是认真听守英的报告，也是希望在这方面有所补课，坦率地讲，也是为下一步制订政策开始一个起点吧。所以，我想听了以后讲三点意见：

第一，这件事非常重大，应该早一点关注这方面的事。如果说两个目标：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几年，那么百年目标中国梦我们不能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功劳簿上。城乡差别如此之大，到了什么程度？守英刚才讲了很多了，但我以为如果还要补充的话，其实揭示城乡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首先，收入是非常关键的，即便到去年还是 1:2.72 的关系，农民收入 12363 元，城镇居民 83616 元，39 年改革城乡居民收入比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1978 年是 1:2.56，去年是 1:2.72，所以收入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太大。从城乡的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事业的发展，不管中央这些年给了多少补偿，但是差距没有明显的缩小，在很多方面甚至还是扩张的。大家从硬件建设上来看的话，当然要比我们所谓的软环境要好得多，如此就导致了新的城乡失衡。这种城乡失衡实际上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讲了，所以问题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我们必须从两个目标的角度来思考预算。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高质量还是一般质量，特别是到本世纪中叶，我们真正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民族之林，或者叫先进民族之林的话，这个问题必须从现在开始高度关注。

第二，原因要讲清楚。原因讲清楚有两个问题：第（1），有没有一个全球共同的规律？换句话说，在高速增长时期、在转型时期，从东亚国家来讲或者说从新兴国家来讲，或者从

老欧洲的角度来讲，有没有规律？尤其在高速增长时期，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张，然后由没有差别或者说到差别扩张，再到差别缩小，有没有一个共同规律？换句话说，守英教授再找一找世界上，尤其东亚国家这块的经验，认真分析。从规律上讲，这也是必须经历的阵痛，或者说中国特色，大家都要思考。第（2），确确实实从中国的文化传承来讲，“厚城薄乡”、“重工轻农”，我们这么多年甚至包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这个思想、思维观念没有缩小，反而在很多层面上是非常显性的。我个人的经历比较丰富，因为我二十年前就当过县委书记，我还做过扶贫工作，当过扶贫工作组组长，坦率地讲，我们的省以上的干部，省以下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们，你问问他们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农业、农民尤其农村想得很少。深圳市委书记，我就不点名了，公开地讲“我们要消灭农村”，这是十年前的话。二十年前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地委书记说：“我们不缺管农业的人才，我们缺的是搞工业的人才，我们所有的人都懂农业。”他的原话就是这么讲的。可见在这些领导人的脑子里面，农业、农村就是一个很落后的概念，农业与农民都需要淘汰。刚才朱教授也讲到几个方面，我都记下来了，比如说规模经营、限营这些是不是对它直接或间接的发生影响？这个我且不谈，中国历史上一直有“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现象，农民是一个不受待见的职业，农村是大家都希望尽量逃避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原因我们要分析清楚。

从政策研究者甚至制定者、实施者和我本人的角度来讲，我其实更关注的是第三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所有乡村的或者叫丰富多彩或者叫恢复或者叫重新富有生机，产业太重要，我们正在研究这个事——乡村治理，今天我们司里面就坐了一大堆人，在讨论相关问题，所以到这边来听一听。当时我就讲，第一，要有产业，这个产业如果我们仅仅聚焦于所谓的传统的农林牧渔，如果仅仅停留在过去的物质产出的上面，是远远不够的。你看刚才的好多幻灯片，几千年前这个产业就存在，但是几千年对于这个产业是要求他物质产出，而不是其他的功能释放。那个梨树 3000 年、300 年还是开这个花，但是现在有多少个叫梨花节的？那个油菜 3000 年前就有、300 年也有，现在我就问大家包括我们这边有来自于基层的，我们讲的油菜花节，很多地方种油菜，并不是要靠它产点油，包括你说的老牛耕田，我坚定相信 100 年以后也有，但是它已经不是作为生产方式而存在，它是娱乐观光、休闲的方式而存在。包括你刚才讲林、水，北京 50 公里以外你说那种生产方式，现在它一定是以一种娱乐方式来做大文章。（旁：张司长，我提供一个数据，北京市划了 7 个生态涵养区，我们计算了生态复活价值，每年的年值和当年的 GDP 相比，全市 14.2%，涵养区 98%，利润 3.6 倍，）包括安主任讲今年还要好。我就提供两个产业的数据：第一个观光旅游休闲。去年增加 5700 亿，相当于 6.3 千万亿的农业增加值，百分之八点几，而 6.3 千万亿相当于我们 GDP 总量 74.4 万亿的 8.6%。一个产业 5700 亿，差不多占了这个产业的 8.9%的话，这个产业一定是不容忽视的，去年吸纳了 22 亿人去乡村旅游，解决了 829 万的就业人口，解决了 645 万的乡村的就业，直接从业人员 829 万。第二产业，农产品电商。农村电商这个行业去年报的增加比是 8549 万，吸纳的劳动力 2000 万个，整个农村电商 58 万个行政村，大约 60%以上。换句话说，40 万个村已经有人做电商，电商的总数是全国电商的 25%，农村电商营业额 17.5%。这样一些新产业、新行业包括生产性服务、农产品加工，你看每一个好的村庄，它背后一定有一个村品，但是我们现在看着比较光鲜的是所谓的旅游。如果你再看看我们所谓的“一村一品”，这里面就大了，所谓“一村一品”，梨长得多，要“一村一品”，把茅草编成筐，它也是“一村一品”，做个手工艺品、画个农民画也是“一村一品”，全国 58 万个行政村，大约有 10%，6 万个左右在“一村一品”上面做得非常好。

第三，农村相当一部分消亡是必然的趋势，但我更想讲的是保护。就是你刚刚讲，它不仅仅是人文情怀，我为什么喜欢守英？因为他写的很多东西我都读，前一段他写他们家乡的

事，我还发表了感言，我说从文字的角度来讲写得非常好，文学造诣很高，当年他读复旦，我们只能读文学院，到底不一样，我们根本是想都不敢想。这是第三个问题，农村在大拆大建的过程中要怎么样保护好。

第三，农民分工、分业一定要主动。这个今天不展开了，从农业生产效率来讲，最近几年变化很大，但是很多人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农民减少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有两个数据希望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就是 1978 年 27% 的农业产值是由 70.5% 的农民创造的，但到了去年 8.6% 的农业增加值是由 27% 的农民创造的。换句话说讲，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提升的速度大大超过二、三产业，但是还不够。

最后，改革。改革的唯一路径就是提升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效率、组合方式。

我已经占了很多时间，不好意思，谢谢！我建议明年的一号文件第一条就是检查今年一号文件关于中央土地政策落实的情况，让各地作出汇报，看他们做得怎么样。

**张静：**

我们请宋洪远主席作评议。

**宋洪远：**

好，我用三分钟的时间，想谈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个研究报告我个人听了以后觉得很有特色，值得我们学生学习。一个就是学风，现在我们经常提学风，怎么能够以行走的方式调查大地，这点很不容易，你跑了很多地方，有的地方像西藏还有风险。二是方法。与农民交谈，到村里去看，通过访谈，然后进行观察，这也是我们做农村问题研究的人值得学习的。三是他最后有五个方面的基本判断或者说五个方面的政策思考，我基本同意他的判断和思考，为什么呢？他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和提出这样的思考，主要是他有实践。他的那些案例里面大多数是不好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好的，因为他要回答“衰而不亡”嘛，他要讲些好的。所以，从学风、方法和揭示的问题来看，我一个评价就是：守英这一年多基本实现了从以政策研究为重点到以学理研究为重点的转变。这是我听了这个报告的三点体会和感受吧。就是说他研究、观察的一些问题，其实更多的是供人思考的，改革回答的问题实际上没有引发的问题多，引发的问题比回答的问题还多。我就接着这个事，结合守英的报告，引发了我的三点思考，我觉得这可能是守英要做，也是我们其他人要做的。守英知道我在做村镇城市化的路径和自主创新的研究，他是在外面跑，我是准备就研究 4 个村，4 个村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类型，看它到底怎么走的。我的三点思考是：

第一，发展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的转型实际上是两个转型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是发展方式，发展有转型，一个是制度的转型，就是制度改革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从发展的角度讲，官方语言是“实现小康的现代化”，国际经验就是“三个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这是发展转型。在发展转型里面，我们在做制度的转型，比如说最根本的改革是市场化，我们现在就锁定加速市场化改革。再比方说信息化的分析，不管什么潮流的出现，还有新世纪以来，你看看信息化给我们解决什么问题？过去我们老讲的小市场和大市场对接，现在还是大问题吗？不是的，就是一个互联网\*就解决了，买全国，卖全国，农村的农产品能卖出去，城市的工业品也能买得到。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两个转型”，那个

“三化”和这个“三化”，我觉得前面“三化”是方向，后面“三化”是基础、是轮子，你看没有市场化的运营，你说哪个国家实现了现代化？OECD的三个成员加上非OECD的5、6个国家，现代化的国家都是这样。发展与转型的关系，到底是谁推动谁？按照制度经济学来讲，发展是环境，制度是安排，所以，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第二，就是农村的“两个改造”的问题。村庄的改造和农民的改造也是这种关系，就是说，通过改造农民，才能够促进村庄的改造。就是我们说的从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建设，我看过张静教授写的关于乡镇改革的那本书，当时我们在研究乡村的公共财政和治理，这个东西你要掰扯清楚，是个很难的问题。最近我和张司长参加了农村改造的问题，很纠结的一个事。我个人的理解可能农民的改造是主体和方式的问题，村庄的改造是土地和产权的问题，但是这两者又分不开。

第三，就是刚才守英提的部分衰落和部分振兴的关系。我觉得没有部分的衰落是很难谈振兴的。改革以来，我们的乡镇村委会由过去的60多万个降到不到50万个，10多万个没有了，这是划掉了也好，衰掉了也好，反正是没有了。另外，我们乡镇由5万多个到现在的3万多个。当然撤乡并村这是一个方面，这是人为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部分衰落，就没有部分振兴。比方说现在我知道的千亿元的村有3个，就是这个村的总收入每年达到一千亿，百亿村有35个，这不是振兴了吗？你到这些地方看，那比我们的很多镇甚至县都要漂亮。我去海南，特有意思，他说：我海南全省的GDP是4千亿，按照你说的这4个村就干过了。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可能它的衰落恰恰给了别的村庄生长的空间。比方说西北有一个村，它的收入达到1千亿，它就6个板块，它不是采取的并村的办法，并村会惹麻烦的，比如社保等问题，它是采取的租赁的办法，就是我没地，我就租你的，然后我搞产业，6个板块一年一千亿，很多是从其他村招来的，很多不要的给整合了，所以这个怎么办？将来大家不是要合作吗？可能下面找路子是最困难的，就是到底是解决大部分村庄的衰落，还是……，总之，要走出一条乡镇村庄现代化的路子。我想的就是这三点思考，我觉得引发的问题，比你回答的问题还要多。好，谢谢！

**张静：**

我们的时间已经非常接近12点了，我们是不是给来自基层的何书记一些回应的时间？

**何允辉：**

我是浙江义乌何斯路村的，我以前是个商人，回去建设何斯路村花了十年的时间。这个村庄共有1023个人，人多的时候有900多个人。10年间村庄是不抓计划生育的，我们是一直放开，但是我是反对有精神病的家庭乱生育的，所以人口一直在增长。收入从2008年的4587元到2016年人均收入36060元，整个村庄的集体资产也是从亏损30来万到现在差不多有一个亿的资产。村庄每一个年满50岁的女性和年满60岁的男性都交了社保，村里的妇女现在一个月可以拿1685元的工资，男性拿1800元的工资。在村庄可以发工资的人群中老年人是323个，村庄一年老百姓主要的收入来自于财产性的收入，老百姓通过租自己的房子，还有就是老百姓本身参与经营，还有一块就是工资性的收入，工资性的收入一年大概有500万元，现在回村的大学生也比较多。

当时的思考就是想把乡村复活，就想到要给乡村一个好的策划，当时想到怎么样让农民有钱，就想到了产业方面的策划。另外一块就是作一个人文方面的策划，我觉得农民要改造

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的道德素养，怎么样让农民的文明程度提高。与其说这些年给村里做的农民生活改变最大的一块成果是经济收入的话，不如说是农民道德素养的提高。何斯路村每一年会进来 20 万游客，通常都是通过预约的形式进来的，我一直反对大量的人进来，破坏乡村的生态。不管哪一级部门、专家学者来到这里基本上都是要收费的。村里也做了一个“百万育才计划”，培养村里未来的接班人，这个钱是由我自己掏，我先后带他们到全国各地去游学，当然来过北京，北京当时是把我们当作台湾同胞看待的。另外村里有一个“功德银行”，现代人抓经济的时候，很少把道德理念或者说精神文明的东西向物质文明去转换，我就把精神层面的东西转化成生产力，村庄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账号，把你的善言、善举、善行都存储到账号里面去，村庄有 40 多个义工从事这方面的记载，当然有一个积分制，村庄每隔两年会评出对乡村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如果你做得好的话，你有什么困难向乡村提出要求，我们都会满足他，最大的奖项是奖励一幢宅基地。我也是属于胆子比较大的，是厉行改革的那种人。村里面有一所老年大学，每一位老人都有大学毕业证书。村里现在 70 岁以上的人吃饭只花两元，老人们都可以去吃。

我想到一个村庄要有好的带头人以及甘愿为村民做奉献的人，当然他们也是何斯路的人。做这一块是挺累的，包括我自己还有我周围的人，还有何斯路村在外发展的成功人士，哪些人士来做决策？哪些人士来执行乡村的建设？这些人群都是为何斯路村的建设出了力量的。第三块，一个乡村建设得好不是靠政府包装出来的，而是靠全民发动，大家一起来做自己乡村的事情。乡村的未来老百姓是受益的主体，因此何斯路村的建设不是靠政府给你几千万，当然党的引领是要的，但是基本上想法是靠我们自己村里来搞的那一套东西。因此，你多给我钱我也不要，要让农民自己来搞。很多事情包括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前面看村里有一个酒店，花了 3800 万的钱造起来，没用政府的一分钱，是靠我们自己建起来的。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农村集体，各位专家可以来看看，我把何斯路的生态资源折合了 25% 的股份，然后让每个农民从口袋里掏钱，用资本换股份，集合了 75 个股份来完成村庄 100% 的建设。我当时跟人家讲是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的结合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的发展这些年是比较好的，我也希望自己到全国各地去，到一些落后的地区去，通过何斯路这样全民发动的形式，来共同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园。这个村庄还有很多外来的农户，我们这一个区就集结了 70 多个大学本科以上的学生，最高学历的一个大学生她的英语是 8 级，是安徽的一个学生，她在何斯路创业，长得也很漂亮。村庄里面还有 5 个国家的老外也住在那里，住在那里的所有老外都持有一张由我签发的“何斯路荣誉村民证书”，他们住在那里每个月要出来做义工一天。

### **张静：**

已经到 12 点了，刘教授，要不你回应几分钟？

### **刘守英：**

我回应一下，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大家刚才提了非常、非常带有本质性的问题，一般来参加我们会议的人不琢磨这些事也不会来，它又不升官又不发财的，但大家都很认真的提了一下，我回应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农二代”的走向问题。“农二代”的走向问题，飞舟的观点就是说可能家庭周期到了的时候，他到了四、五十岁，他会回去怎么弄呢？他还会跟一二十岁时一样在外面漂吗？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的观点就是，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件事，那么

中国的现代化要出大问题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继续让“农二代”还是跟“农一代”一样毫无任何寄托的生活，漂得差不多以后再漂回去。现在的难度在哪里呢？难度就是“农一代”是没指着在城市呆的，他回去也能活下。“农二代”的问题在哪里？“农二代”没有要回去的，未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他在城市不能落脚，这些人最后可能就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会是一个大的影响。比如像南非就是白人和黑人，美国遗留下来的就是南方和北方的问题，那么中国可能大的断层就是在“农二代”和“农三代”过渡的这个点上。我觉得这时候我们会不会在政策上有大动作？如果没有大动作的话，继续按“家庭周期”走的话，中国就成了一怪物了。就是说他可能继续这么走下去，最后无可奈何，但是这个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讲，我觉得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朱老师讲的这个事，我们现在要做的大量的事是什么？你不要让它死得太难看。这里面很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这里面就是说一些重大的政策、制度、思维这些东西在中国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还不花功夫去搞这件事，我是觉得我们的村庄会过早、过惨、过快的衰亡。这种惨象是跟我们的公共政策有关系的，比如说你怎么对待农民？怎么对待农业？怎么对待乡村？就是刚才张司长讲的这三件事，这三件事是缺一不可的，这些事情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如果再不去做大的政策调整，我觉得要出大问题。这里核心的问题，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目前对待乡村的这套基本思维还是在延续国家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对农业、农村、农民的这个功能，这个东西没改。它为什么老在摇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搞不下去了，就摆回去一点，他能搞下去，他的手又回来了。根子在哪里？根子就是“你农村就是干这个的，农民就是干这个的，农业就是干这个的”。我觉得这个事是必须要调整的。

第三个问题，在中国乡村的演化过程中需要有一个政策干预。我不主张乡村的现代化完全就是一个自然演化，它的问题是在哪儿呢？中国跟小经济体制不一样，你牵涉的群体太大了，那么大的一个群体，如果最后又在城市落不下来，然后乡村又回不去，这个国家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公共政策需要有干预。但是，这个干预的方向需要想明白，你还是要农民主体，就是整个干预的基本路向。我们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当然，我们这些年做了很多的事，但是有些是吃力不讨好，原因是主体出了问题，最后变成政府之间在搞事，搞了半天的结果是你跟农民是两张皮，包括你的扶贫，你扶贫的力度还不大吗？但最后的结果是政府之间在竞赛。就是说，你这个主体一定要明白这件事。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适当的政策干预，这个事你一定要落地，如果不落地的话，整个政策干预最后就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刚才张司长讲到村庄的重要性，我毫不客气地认为，在整个中国的公共政策中，村庄的重要性太弱了。比如我们重视农业是因为城市要吃粮食，重视农民两层都有，第一个就是担心农民闹事，另外就是农民能为城里服务，这两个是相对来讲，关注得比较多，但是对村庄的关注还严重不够。村庄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村庄本身是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它不是空的，它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村庄里面是人的集合体，村庄里面有文化、历史和制度安排，如果你仅仅把村庄看成一个空间，是不行的。比如“新农村”也好、“美丽乡村”也好，我们只把它当作一个物理空间来看待，而没有把村庄当成一个制度来看待。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制度来看待，你设计的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五个问题，就是农民跟村庄这“两个改造”的关系。我为什么讲整个这一轮变化的由头是“出村”带来的？其实最后就是村庄跟人两个改造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关系



呢？它是由人动，就是人先出村，人出村以后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村庄跟着人的走向而变。由于人走，而村庄制度在维系原来人不走的时候的村庄制度，于是就出现变化和瓦解。所以，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先后关系，就是人先动，接下来就是村庄制度在动。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出在哪里？人已经动了，但是村庄制度没跟着动，我们现在的村庄制度还是维系着乡土中国时期的或者说人不动时候的制度形态，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因此，我们要更多地关注人已经开始自我改造或者被改造了，但是村庄制度怎么适应这个改造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是关注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再进一步去研究中国村庄制度的演化规律。因为整个这一轮村庄的演变是决定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根本，所以这个事如果不搞透，最后中国的乡村现代化是要出问题的。

最后，感谢大家！

**张静：**

好，已经持续三个多小时了，我们的讨论不得不停止，我知道有很多人其实是想参与讨论的，但今天没有机会了，咱们再找机会吧。好的，谢谢守英教授！谢谢各位评议人与各位特邀嘉宾以及在场的所有关心这个事的同学和老师，谢谢大家！